

列宁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19年，当年轻的苏维埃与国内反革命武装作生死搏斗、后方全力支援前线的时候，莫斯科—喀山线铁路工人第一次开展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深为工人阶级迸发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精神而感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并写作《伟大的创举》来阐释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列宁强调：“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平凡却生动的群众

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既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又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他们平凡却生动，他们是决定社会变革的唯一力量。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出现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当时国内外阶级敌人为了扼杀苏维埃政权，互相勾结，挑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白匪叛乱；打着革命旗号的机会主义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趁机叛乱。关键时刻，苏联工人阶级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叛乱，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用英勇果敢的革命精神，自觉组织起来，实行不要任何报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列宁领导的卫国战争，维护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在《伟大的创举》中，列宁满腔



□ 刘清泉

热情、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英勇奋斗的首创精神，深刻地指出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巨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列宁认为，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和疲乏，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从事不领任何报酬的额外工作，并且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诠释了后方工人极伟大的英雄主义，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彰显了人民群众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建设主体的平凡而生动。

你看，“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列宁写道：“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

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

共产主义建设经验来自平凡却生动的生活并受其检验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它的出现、成功和推广说明了“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验证了无产阶级胜利的基础，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层次的社会劳动组织”。

列宁强调，这种“稀罕”的开端发生在“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的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这一“非常重要的开端”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

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为了完全消灭阶级，消灭城乡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对于“公社”一词定义的讨论也充分说明了共产主义建设经验来自平凡却生动的生活且受其检验。曾经，“公社”这个词用得太过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自命为“公社”，因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禁止动辄使用“公社”字样，“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无偿地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模范地进行工作，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这方面是个十分宝贵的例子。莫斯科—喀山线铁路工人们是先在实际上证明了自己确实能像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实践证明，唯有展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样类似活动的组织，才有资格称之为“公社”。

共产主义事业最终是要解放平凡却生动的群众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使人从自然神秘力量中解放出来，因此，人的解放意指人与自然的博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在阐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多次强调，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重要任务。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劳

动，因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是朝向自由王国的开端。由此，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在变革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纪律，促使平凡却生动的群众最终得到解放。

马克思曾提出了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社会形式，其中，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认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人也解放了自身。列宁在阐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时特别强调了“自愿自觉”一词，表示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说明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最终要实现人的自身解放。

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彻底巩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才会使农民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实的拥护者。

重温和学习列宁《伟大的创举》，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当准确把握列宁“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思想真谛，认识到共产主义事业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平凡日子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动实践和辩证发展，最终到达“自由王国”的彼岸，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重读经典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以文风引领世风的治学之道

□ 葛传根

《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在一代文学巨匠韩愈身上得到很好体现。东汉以后，历魏、晋、宋、齐、梁、陈、隋至唐，约400年时间，骈体文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文风淫靡，华而不实，不关心民生疾苦、不顾国家安危，一味追求形式的浮华艳丽，使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消失殆尽。此时是韩愈，顺应时代要求，担起文化卫道的责任，领导了古文运动，以正确的治学之道，革新文风，刷新世风，成为以文风引领世风的典范。

文以载道，不务虚言。韩愈主张，文章应为儒家的道统服务，发挥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针对当时佛老学说的泛滥，韩愈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圣人之道泯泯不能流传。他在《原道》中说：“孔子传之孟轲，以正确的治学之道，革新文风，刷新世风，成为以文风引领世风的典范。”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韩愈以“为往圣继绝学”的决心，与当时流行的佛老思想相抗争，努力让儒家思想重新回归正统，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开创发了先声。所以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如果说韩愈入圣之道是韩愈文以载道的宗旨，那么“辟佛老”则是他文以载道的命脉。他在《答李翱书》中说，自己读书时，“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惟陈言之务去”“乃徐有得也”；自己写文章时，也总是反复修改，决不允许有浮华的虚言和佛老思想的存在，“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甚至严格到不希望别人夸赞自己的文章，反而认为被人讥笑是值得高兴的事。“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己之说者存也”，唯恐自己的文章带有当时文坛流行的社会弊病。由此可见韩愈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为文的崇高追求和扭转世风的坚定决心。

言为心声，辞必己出。韩愈提倡，写文章就是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向古文学习，应该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不拟古、不袭古，文章的言辞应从自己的心肺中流出。“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

足，不可以为成文。”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创造丰富的文辞，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不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创作。韩愈就是这样的语言大师，经他创造性使用过的很多词汇，马上变得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如《原道》中的“坐井而观天”“语焉不详”，《师说》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争臣论》中的“直言骨鲠”“从谏如流”，《平淮西碑》中的“文恬武嬉”“休养生息”，《送穷文》中的“蚩菅狗苟”“垂头丧气”，《论淮西事宜状》中的“力尽筋疲”“虚张声势”等等，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中。这些词汇并非每一字都是韩愈首创，但他能够化用古人名句，通过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变成自己的血肉，附在自己文章的筋骨上，浑然天成，恰到好处，这就是大师的匠心独运，这就是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

返本开新，不拘一格。为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韩愈提倡学习古文，但他所说的古文与先秦两汉的散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种从思想到语言都吸收了民间清新刚健之气，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全新散文。即假复古之名，开创了一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不拘泥于形式的流畅散文，实质上是一次文学创新。一扫东汉以来骈体文的侈靡之风，使已被堵塞的圣贤之道再次畅通无阻。韩愈反对骈偶文体，但并不排斥对偶和排比句式的运用；韩愈主张古体散文，但并不一味追求古文的长句。他的散文常常是长句短句交替运用，散句和骈句相互衔接，使他的文章变幻莫测、深厚辽阔。所以苏洵称赞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韩愈继承了前代的优秀文学遗产，不拘一格，开创了一代新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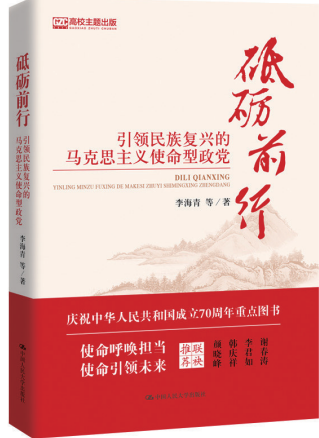
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古文运动并非自韩愈始，但韩愈却是最成功的。究其原因，与韩愈的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有重要关系。韩愈之前的古文提倡者要么是思路不对，要么是愿望与实践相矛盾，一边提倡古文一边自己仍然用骈文在写作，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为他们失败的原因。只有韩愈不但在系统总结前人主张的基

础上，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作理论，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写出大量不朽的散文名篇。这样不但使创作有了理论的指导，而且使理论得到实践的验证，双璧生辉，相得益彰。所以宋代秦观感叹：“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应该说，韩愈能够成为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雄冠“唐宋八大家”之首，与他身体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着必然的联系。

文为先为人，立言先立行。韩愈认为“行峻而言厉”，一个人的文章与人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家直道而行，事信而言文，这种高尚的人格与风骨，对写好文章来说，比追求华而不实的形式更为重要。他在《答李翱书》中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这就是说，只有首先做一个充满仁义思想的人，然后才能把文章写得气势恢弘。韩愈强调，立德修身决非一日之功，而是一辈子的事，要“终吾身而已矣”。有学者认为，从做人上探讨如何写好文章的问题，韩愈在古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写得雄深雅健，与他为官的仁爱和对人的刚正密切相关。韩愈为官，总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了很多对当地百姓功德无量的好事。韩愈做事，总是力求把事情做得公道、正直。当韩愈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性命不保时，他直言忠谏，“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口求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毫不避讳地指斥酷吏的巧取豪夺。当一个藩镇将欲背叛朝廷时，韩愈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入营，最后一人定千军。正是这种凛然正气和士人风骨，造就了韩愈不同凡响的文笔，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传世佳作，真是文如其人！

今天，重温韩愈当年的治学之道，对我们为学为文仍然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文章千古事”，学者决不可不察！

治学之道



任何政党都具有一般政党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具体政党所具有的独特性。然而，发源于西方政治现代性的流行政党理论，却倾向于强调一种偏狭的普遍性，即以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为基础，建构一般的政党制度比较框架。这造成的实际后果，即把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作为一种不成熟的有待进化的“他者”来看待，却丝毫不考虑现代政党政治本身可能具有多样化的模式。所幸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型政党政治的鲜活实践，呼唤着一种新的政党理论的诞生，它应该从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而非从西方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

李海青等著《砥砺前行：引领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书，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出发理解和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是从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探索性力作。该书虽由多位作者合著，但在体系上却是机器的整体，主要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思想建党的高度重视、对制度治党的持续探索、对群众路线的自觉坚持、对党性修养的严格要求、对人类社会使命承担、对思想方法的系统掌握这7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具体特征，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

该书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请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并且它还能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思：到底应该如何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一份好的理论研究并不在于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而在于提出好的问题，不断激发出有价值的新探索。

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概括不是精准到位，不仅取决

于它提供的规范论证与阐发是否逻辑自治，还要看它是否能够对中国共产党与别的政党进行有效区分。比如，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能否称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如果是，那么这一概念就不足以界定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界定，苏联共产党一度曾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但后来腐化变质了，也就不是了。那么问题在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腐化变质，以致丧失了使命感？也就是说，相较“使命型”这一定语，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其他一些特性可能更为根本。正是因为丧失了这个根本，所以苏联共产党才背弃了使命。

在笔者看来，这个根本反映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特性，而“使命型”只是来源于并附着在这个根本之上的次级特征。实际上，作者在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下定义时，也强调了它“以对人类社会发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而在具体阐述其特征时，还指出，“历史规律之于使命型政党的建立具有内在的根本意义”，“历史规律揭示使命与方向，而历史的规律与逻辑恰恰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予以揭示的”。可见，对“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构成前设规定的，乃是其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首即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此，“两个先锋队”鲜明而准确地界定了中国共产党最为根本的内在特性，即先进性。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成为“领导核心”，而“三个代表”只是这种先进性的具体表现。至于“使命”，更是附属其后才予论及。这充分说明，较之“使命型”，“先进性”或许是对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更好描述。

早在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就在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专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苏联共产党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逐渐丧失的

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 认真对待

□ 刘晨光

那个“根本”，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中最根本的就是它的先进性，包括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进性。当然，中国共产党要永远保持自身先进性，就要不断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是《砥砺前行》一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虽然“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是否能够精准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还有待商榷，但它为我们从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范例。

读而思